

民族地区慢性贫困问题研究

——基于四川大小凉山彝区的实证分析

蓝红星

(四川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雅安 625014)

摘要: 借鉴国外慢性贫困最新研究理论,提出了一个分析贫困代际传递的框架,并以四川大小凉山彝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父辈贫困的家庭,陷入慢性贫困的概率大大增加;而父辈不贫困时,即使家庭现在已经陷入贫困,这些贫困往往属于暂时性贫困或者短期贫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来缓解慢性贫困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慢性贫困; 贫困代际传递; 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 F328;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409(2013)06-0073-06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of Chronic Pover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Sichuan Liangshan Yi Minority Regions

LAN Hong-x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625014)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latest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theories, puts forwar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nd then empirically analyzed Sichuan Liangshan Yi minority regions. The result shows that, poor families whose father also poverty, greatly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fall into chronic poverty; Families whose father is not poverty, even now in poverty, that poverty is often a temporary poverty or short-term poverty. On the above basis, it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alleviate the chronic poverty by block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Key words: chronic pover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一、引言

贫困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关于贫困的研究学者们将重心主要放在致贫因素、贫困衡量、贫困的影响等研究领域,却往往忽视了贫困的“生命周期”,即一个人或家庭随着时间而摆脱(且经常返回)贫困的轨道。近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开始关注“慢性贫困”(Chronic Poverty)及相关研究。慢性贫困是指贫困状态持续多年(一般为5年或5年以上,甚至贯穿穷人一生)并且可能将贫困传递给下一代的贫困状况^[1]。

慢性贫困研究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的贫困问题研究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研究力量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伯明翰大学的专家学者为主,并联合国际上十几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组建慢性贫困研究中心(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CPRC)。2004年,CPRC发布了第一部慢性贫困研究报告(CPRC 2004~2005)，“慢性贫困”是指一个个体经历

了5年或5年以上的确切的能力剥夺^[2]。2008年,CPRC发布了主题为“摆脱贫困陷阱”的第二部慢性贫困研究报告。近年来,国外研究人员开展大量的慢性贫困研究工作,研究主要聚焦于慢性贫困与环境(Parry M L, 2004)、慢性贫困的动态分析(Davis P, 2006)、慢性贫困的代际传递(Driscoll R等, 2005)、残疾与慢性贫困(Levy S, 2007)、脆弱性与慢性贫困(Prowse M等, 2008)、慢性贫困与社会排斥(Janet S, 2003; Hoddinott J, 2010)等。

国内关于慢性贫困问题研究始于2002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2)》采用了瑞沃林(Ravallion)和加兰(Jalan)对于贫困动态中慢性贫困、暂时贫困的分类,对1997~2001年16000个调查户进行连续观察,以贫困线为标准,以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福利尺度,得出贫困指数的90%属于暂时贫困,仅10%属于慢性贫困。岳希明等(2007)采用罗杰斯(J. Rodgers)的总体贫困分解法,把全部贫困分成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其实证部分的工作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2)》做的贫困指数分解方法

收稿日期:2012-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09&ZD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90086);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般项目(CR1023)

作者简介:蓝红星(1981-),男,浙江武义人,博士、讲师,四川农业大学农村经济管理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农林经济管理。

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后者对两类贫困的收入和消费方面做出更为详细的对比分析,并考查了贫困家庭户主年龄、教育程度及家庭规模对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程度。同样的思路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中期评估报告中也有所提及。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的奋斗目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贫困人口显著减少”是我国“十二五”规划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我国虽然不是慢性贫困国家,但民族地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慢性贫困现象。深入研究民族地区慢性贫困问题,如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贫困的持续性、贫困的脆弱性等,是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慢性贫困的理论分析

(一)慢性贫困的成因

根据CPRC(2004)研究估计,到2015年即使全球发展目标能够完全实现,全世界仍然有9亿人生活在贫困中。因此有必要对慢性贫困的成因进行梳理。Hulme D(2003)系统地将“生计分析”(Livelihoods Analysis)引入、应用到慢性贫困的成因分析中。“生计分析”是一种结合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缝隙方法,采取这种分析方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理解慢性贫困的社会特征。“生计分析”法对导致贫困脆弱性的原因进行了许多研究。Hulme D在对贫困的“生计分析”过程中,采用贫困代际传递的分析框架(如表1)。

表1 慢性贫困的成因分析^[3]

	成因
经济	1. 个体缺乏生产技能、生产率低下 2. 国内不公平的经济政策,如城市优先发展 3. 经济发展不稳定,波动性大,劳动力市场受经济冲击大; 4. 国内科技落后,国际上不利的经济秩序,全球化对穷人的冲击
社会	1. 因贫困导致的各种歧视,丧失发展机会 2. 缺乏信用,社会资本欠缺 3. 贫困文化,如高依赖性 4. 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差,如健康状况和艾滋病
政治	1. 政府管理调控能力差 2. 地区间暴力冲突不断,社会不安全 3. 被地区或全球霸权控制
环境	1. 自然资源较差,边际区位、环境恶劣,容易得地方病 2. 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

(二)慢性贫困与贫困代际传递

慢性贫困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ly Transmitted, IGT),也有学者认为用 Generation Conduction 更准确)。贫困代际传递既可以看作是慢性贫困的特性,也可以看作是慢性贫困的成因^[4]。

贫困代际传递重点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在贫困家庭出生的子女成为贫困子女的可能性有多大?第二,贫困(或非贫困)子辈将来成为贫困(或非贫困)父辈(重新开始这个循环圈)的可能性有多大?

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贫困传递的对象,包括个人间的贫困代际传递、个人和家庭的贫困代际

传递、贫困在社区、国家和市场等“公共”范围内传递;第二,贫困传递的内容;第三,贫困传递的方向,包括从上一代向下一代传递、从年轻一代向年老一代传递、“隔代”传递。从直觉上看,贫困代际传递是贫困从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传递(尤其是从父辈传到子辈),为了保证将来年老时能得到较好的赡养,父辈向子代进行资源“战略”传递是必要的^[5]。此外,代际传递能够向两个方向“传递”——掌握较多资本的人群能够向“年轻”和“年长”两代传递,反之亦然,慢性贫困的代际传递也相似。

贫困的代际传递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资本”的代际传递。这些资本主要包括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自然或环境资本(Natural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且各种资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表2 不同类型资本在代际间的传递

代际传递的内容	代际传递的形式
1. 物质资本	
金钱	继承、遗产、剥夺
土地	储蓄、养老金、保险
牲畜	嫁妆
房屋和其他固定资产	馈赠、欠债
其他生产性、非生产性的有形财产	退休
2. 人力资本	
体魄健康和良好的精神	母婴传播,传染病
智力、知识、技能、处理事情的能力和生存技能	家庭教育,父母教育和技能水平
教育条件	教育设备,学习用品
疾病	父母成功的经验或失败教训
3. 社会文化	
传统、权利规范、制度、价值体系	教育尤其是社会潜移默化
社会地位(如家庭、种族、民族、长相、语言等)	血缘、姻缘、宗族关系
社会精英或政府决策者的可获得性	由地位决定的社交圈
“贫困文化”	长期生活形成的潜意识
4. 自然资本	
生存空间的生态建设	环境改善,可持续发展
公共资源的环境恶化	不计环境成本的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Hulme、Moore等人的研究资料整理得

表2是一个贫困路径传递的分析框架,左栏被传递的内容可以通过右栏中的方式在不同代际间进行传递:例如,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健康状况)会对另一种资本(受教育程度)产生影响。因此,表2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错综复杂的网络,而不是被看作一系列孤立的因素。

三、基于四川大小凉山彝区的实证分析

(一)大小凉山彝区贫困概况

大小凉山彝区是指除木里藏族自治县以外的凉山州所有地区(大凉山彝区)以及乐山市的马边县、峨边县和金口河区(小凉山彝区),主要分布于四川省西南部、青藏

高原东南部和长江上游,区内以高原山地为主,平原面积狭小,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是我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其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扶贫难度大、返贫现象严重,2010年凉山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565元,低于四川省的5140元和全国的5919元。

2010年底凉山州有农村贫困人口54.21万,贫困发生率为28.1%,昭觉县和布拖县分别高达35.68%和35.58%^[6],远高于全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2.8%。

凉山州的贫困人口中有大部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难

以摆脱贫困或者摆脱贫困后不久又再次陷入贫困,带有慢性贫困的特征,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乌蒙山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数据来源与分析

1. 抽样简介及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大小凉山彝区慢性贫困状况,本文选取了大小凉山彝区的6个国家级贫困县和1个省级贫困县,样本村所在县基本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大小凉山彝区6县的基本情况

样本县	总人口 (万人)	农民人均 纯收入 (元)	贫困 人口 (人)	贫困 发生率 (%)	感染艾滋 病毒人数 (人)	不通 公路村 (个)	不通 电村 (个)	不通 广播村 (个)	不通 电话村 (个)
布拖	15.4	2693	36903	25.77	5565	65	52	32	120
昭觉	26.0	2397	59805	26.00	5318	120	139	139	—
美姑	22.0	2606	24271	11.26	1389	104	142	82	197
越西	30.0	2937	51615	18.84	1390	171	37	37	49
甘洛	20.7	2530	35005	20.05	395	50	16	89	105
喜德	17.8	2783	40729	25.14	317	47	28	48	23

注:“—”表示数据暂缺,样本乐山市马边县数据暂缺

调研时根据各县的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确定其抽样数量。在确定各县的抽样数量后再采取随机、等距抽样方法抽取调研乡镇和村,再在实际调研中对各村采取随机抽取10~30户的方法进行调查。最终,调研组对大小凉山彝区7个县的21个乡镇50个行政村的1000余住户进行了调查(见表4),填制问卷1000余份并回收985份,其中有效问卷:925份,有效率为93.91%。此次问卷分为村级和家庭两种,其中村级问卷主要涉及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情况,而家庭问卷主要涉及人口、性别、年龄、贫困持续年限、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等情况。

2. 家庭及人口情况

此次调查涉及925户有效住户,户籍总人口4012人,平均每户4.34人,高于全国平均每户3.10人和四川省平均每户2.95人。主要情况为:第一,贫困户构成:925户家庭中,贫困家庭778户,占有效样本的84%,非贫困户家庭147户,占16%。第二,贫困的持续经历时间:778户贫困家庭,195户家庭贫困经历时间在1年及以下,占全部贫困户的25%;451户家庭持续贫困时间在5年及以上,占全部贫困家庭的58%;132户家庭经历了2~4年的持续贫困,占贫困户的17%。另外,所有贫困家庭中,父辈贫困的家庭有646户,占83%。第三,慢性贫困家庭中父辈贫困情况:451户持续5年或5年以上的慢性贫困家庭中,父辈为贫困的有424户,占94%;父辈不贫困有27户,占6%,详见图1。

其他相关情况如下:第一,民族构成:4012人中,有少数民族3201人,占总人口的79.79%。第二,家庭情况:925户住户中,有居住在砖木房和土坯中的家庭占绝大多数,比例分别是60%和35.7%;拥有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的用户比例分别为18.38%、18.16%和81.51%;此外,有35.24%的家庭存在一定饮水困难,主要表现为季节性缺水。第三,性别构成:4012人中,有男性2059人、女性

1953人,分别占51.3%、48.7%,男、女比例为1.05:1。第

表4 大小凉山彝区调研样本表

调查市 (州)	调查 县	样本数 (户)	抽样 乡、镇	抽样村
凉山州	昭觉县	152	竹核乡	大温泉村、莫洛村、泥惹村
			谷曲乡	洛洛以打村、新凉村、拉哈村
			比尔乡	海乃阿莫村、俄尔阿莫村、阿硕古普村
	布拖县	97	新城镇	塘摩村、拖纛村、南坪村
			美撒乡	莫此村、本子村、美撒村
			九都乡	九都村、洛色村、安洛古村
			洛俄俄甘乡	阿卓瓦曲村
	美姑县	84	井叶特西乡	采竹村、特西村
			酒库乡	塔古村
			凉山州	西山乡
越西县	246	越城镇	城北村、城关村、城西村	
		乃托镇	白石村、莫洛村、乃托村	
		中所镇	下街村、泸谿村	
		白果乡	白果村、曙加村	
		前进乡	基泥村、跑马村、桥头村	
甘洛县	193	田坝镇	羊新村、大树村	
		阿兹觉乡	卡尔村、阿兹觉村	
		玉田镇	勿西村、永久村	
喜德县	95	冕山镇	小山村、和平村	
		则约乡	则约村、石门村	
乐山市	马边县	58	苏坝乡	胜利村、烟峰村

四,年龄构成:15岁及以下人口有1274人,16至60岁人口有2402人,60岁及以上人口有336人,所占比例分别为31.75%、59.87%和8.38%。此外,在15岁及以下人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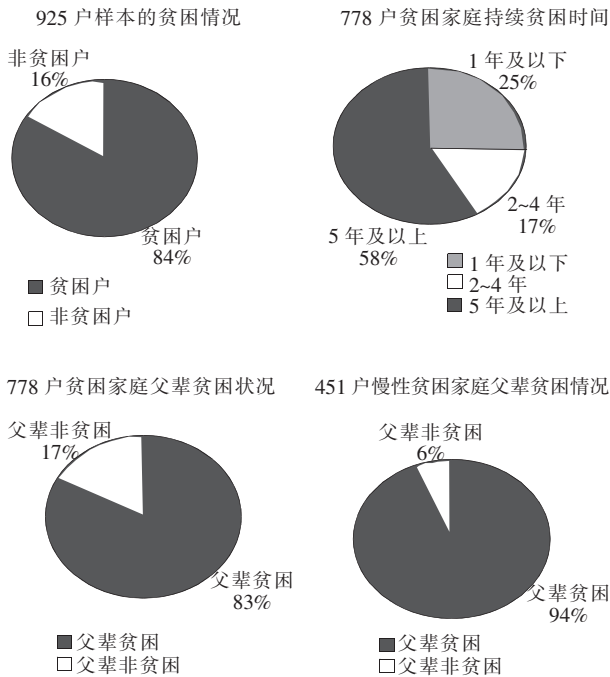


图1 样本贫困构成、贫困持续时间和父辈贫困情况

有男性696人、女性578人,男女性别比为1.20:1;在男女劳动年龄人口中,男性为1206人、女性为1118人,男女比为1.08:1;在老年人口中男性为157人、女性为257人,男女比为0.61:1。第五,教育情况:现阶段正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有961人,占总人口的24.00%,其中男女分别为510人和451人,男女比为1.13:1;在参加劳动的2031人中,文盲、半文盲人口为816人、小学文化程度人口650人、初中文化程度人口440人,所占比例分别为40.18%、32.0%和21.66%。

3. 描述性分析

由以上描述性统计可总结出大小凉山彝区贫困呈以下特点。第一,贫困持续经历的时间长,具有典型的慢性贫困特征;第二,处于父辈贫困家庭的子女容易陷入贫困状态,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非常严重;第三,大小凉山彝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房屋、家电、农用机械等资产状况不良;第四,自然条件差,大多数村为丘陵(半山区)、山区地形,平原(坝区)面积狭小,处于边际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第五,“一步跨千年”的社会制度变革,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和基础事业发展缓慢,未得到较大和根本性改变。

(三) 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慢性贫困实证分析

Logistic 回归分析常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回归拟合,实际研究中常遇到因变量只能取两值的情形,如是否、有效与无效等。对于这种问题建立回归模型,通常先将取值在实数范围内的值通过 Logit 变换转化为目标概率值,然后进行回归分析。Logistic 回归参数的估计通常采用最大似然法,得到的估计值就是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值。Logistic 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ln \frac{p}{1-p} = \alpha + \beta X + \varepsilon$$

其中 P 为事件发生的概率, α 为模型的截距项, β 为待估计参数, X 为解释变量, ε 为误差项。实际上, Logistic 模型建立了事件发生的概率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对调研所得数据进行整理转换,为了研究慢性贫困家庭的贫困是否与父辈贫困相关,是否与贫困家庭的子女数量有关;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必要对相关变量进行定义。其中,家庭是否陷入慢性贫困 (a_1) 定义为(非慢性贫困户 $a_1 = 0$; 慢性贫困户 $a_1 = 1$); 父辈是否贫困 (a_2) 定义为(父辈不贫困 $a_2 = 0$; 父辈贫困 $a_2 = 1$); 是否属于多子女家庭 (a_3) 定义为(家里有3个或3个以上子女 $a_3 = 1$; 否则 $a_3 = 0$)。利用 SPSS17.0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

表5 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

	卡方检验	自由度 (df)	显著水平 (Sig)
步骤 1	28.456	2	0.000
块	28.456	2	0.000
模型	28.456	2	0.000

表6 模型汇总

	-2 对数似然值	Nagelkerke R ²	Cox & Snell R ²
步骤 1	33.106 ^a	0.914	0.736

注:因为已达到最大更迭次数,所以估计在迭代次数20处终止,无法找到最终解

表7 分类表

步骤 1 是否慢性贫困	已观测	已预测		百分比校正
		否	是	
否	295	32	90.2	
是	20	431	95.6	
总计百分比				93.3

注:切割值为0.500

表8 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变量

	B	S. E.	Wals	自由度 (df)	显著水平 (Sig)	Exp (B)
步骤 1 a_2	2.352	1.187	3.922	1	0.023	10.486
a_3	0.857	0.461	5.620	1	0.018	3.859
(Constant)	-4.379	0.346	160.436	1	0.000	0.013

注:在步骤中输入变量 a_2, a_3

上述 SPSS 分析报告结果显示,从表6可以看出,卡方值为28.456,并提供了自由度值的显著水平。表5中 Sig 值为0.000,说明假设模型整体检验十分显著。

从表6模型汇总可以得到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 Cox & Snell R² 和 Nagelkerke R² 分别为0.736和0.914,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表7是 SPSS 根据观测值和模型预测值制作的一个交互表。实际上,模型能预测每个案例“是否陷入慢性贫困”的概率,SPSS 再以0.5为划分标准将案例进行预测分类。这一分类结果表明,观测时没有陷入慢性贫困的农户中,预测正确占90.2%;观测时陷入慢性贫困的家庭,预测正确率占95.6%。总体上,预测正确率达到93.3%。

表8是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检验情况。从显著水平 (Sig) 看,所有自变量都是显著的 ($\alpha < 0.05$),说明肯定

了各自变量的作用。对于回归系数(B),两个自变量的B都是正值,分别为2.352和0.857,说明父辈贫困的家庭更容易陷入持续的慢性贫困,而子女多于3个(包括3个)的贫困家庭,面临成为慢性贫困家庭更大的几率。实际上,通过 $Exp(B)$ (发生比率),得出大小凉山彝区的贫困家庭,当父母也贫困时,陷入慢性贫困(5年以上持续贫困)的概率是那些父辈不贫困而现在贫困家庭的10.486倍。同样的,当家庭多子女时,多子女家庭陷入慢性贫困概率大增,几乎增加了2.8倍,是原来的3.859倍。

实证研究表明:大小凉山彝区的贫困家庭,当父辈也贫困时,贫困时间持续5年或以上的概率大大增加;而父辈不贫困时,即便现在已经陷入贫困,但这些贫困往往属于暂时性贫困或者短期贫困,陷入5年以上慢性贫困的家庭几率只有父辈贫困组的10%左右。

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缓解民族地区慢性贫困

(一) 实施“第二代”发展式扶贫政策

我国的扶贫开发,尤其是开发式扶贫,大多数主要是面向当前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从代际关系来看,实际上扶贫政策设计时主要瞄准“父辈”,以解决“第一代”(父代)贫困人群的贫困问题为主,从短期来看,这种效果明显。但是随着扶贫减贫的边际效应递减,“第一代”为特征的反贫困战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为例,我国当前实行的“雨露计划”就是专门为此设立。一方面,“父代”经过长时间的成长环境影响,以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健康资本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将会变得越来越小,而人力资本提升的难度越来越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成本显著增加,年老“父代”的获取收入时间随着年龄增加而越来越短。

相反,如果将同样的扶贫资源用于“子代”(第二代),其未来的预期收益将会变得更加乐观,因为从本质上说,孩童时期是开发一个人力资本的最关键也是最佳时期,由于作为子辈的第二代相对第一代来说,可塑性要强很多,后天的营养状况、卫生状况、教育状况等对孩子具有终生影响。与其对剩存贫困人口“脱贫拔穷根”困难重重,还不如从长远计,对其家庭进行开发,尤其是对“第二代”进行人力资本开发。

另外,从反贫困的角度可以发现,中国农村的返贫现象非常突出,2010年,民族自治地方达到了15.3%,说明“第一代”为中心的扶贫开发政策对于扶贫效果的稳定性较差。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国家在2011~202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明确指出,“巩固温饱成果”。返贫一方面是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造成,但归根结底是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差,导致贫困人口的抗风险能力弱。相反,如果反贫困政策以“第二代”(子辈)为中心,因为这种政策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高贫困地区群众未来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抗风险能力比较强。

当然,如果单纯实行以“第二代”为中心的反贫困政策,对现处在贫困泥沼中的人群却忽视或视而不见,这又会挑战社会公平。

实施“第二代”为中心的发展式扶贫政策,实际上对“第一代”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政策的有效弥补,不是取

代,需要“第一代”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政策与“第二代”为中心的发展式扶贫政策通力协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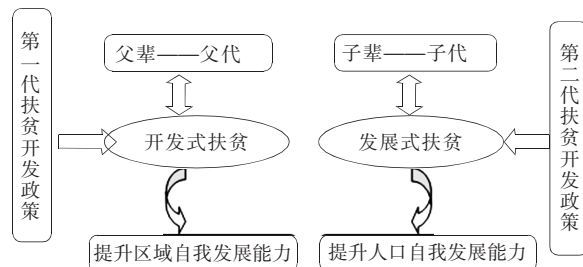


图2 “第二代”发展式扶贫政策

(二) 充分重视妇女在反贫困中的特殊作用,对民族地区女童教育实施“优先”发展计划

受传统文化、宗教等影响,男尊女卑等男女不平等观念在许多民族地区都长期存在。民族地区的女性,无论是未成年女性(包括女童)还是成年女性,其社会地位相对男性来说都要低得多。一个家庭的母亲对子女的成长影响比父亲对子女成长的影响更加显著。在男女不平等的情况下,许多母亲文化程度较低,因为贫困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普遍存在,负责孩子教育的重担就自然落在了“主内”的母亲身上。

一方面,母亲因为其自身受教育程度缺少,往往不能充分认识到教育对子女未来成长的重要性,导致母亲对孩子的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资源有限,如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孩子因为家庭学校之间距离太远,上课时间大大缩短,这些地区就更加需要“家庭教育”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遗憾的是,民族地区父辈中的母亲,因其自身知识水平有限,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以知识为主)就更加困难;此外,母亲因长期受社会传统影响,往往产生“女儿嫁人后是泼出去的水”等观点,使得家庭中的女童相比男童来说,受教育的机会少很多。最终导致“男女不平等——母亲受教育少——子女家庭教育缺失——陷入贫困——强化男女不平等”。因男女不平等导致了成年母亲接受学校教育偏少甚至缺失,母亲文化程度低对子女人力资本影响比父亲大,所以母亲文化程度低容易使得子女因人力资本低陷入贫困,而贫困往往又强化了男女不平等的落后观念。

所以,政府在反贫困政策设计时,应该着眼长远,从保证女童的受教育权利着手,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女性的知识文化水平。例如,可以参照农村养老保险做法,对于“只生一胎女儿的父母,年老之后每月多领取社会保险”。例如在民族地区实行“女童教育优先发展计划”,对那些超额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女童家庭,政府设立专项经费,给予父辈奖励,如女儿高中毕业,年老后父母每月多领100元养老金,家里如果有女孩大学毕业,年老后父母每月多领200元养老金。

(三) 加强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教育,实施学龄前儿童营养和健康干预计划

以可传染病、遗传病等为代表的疾病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恶性传递,导致很多贫困家庭的无辜孩子一出生就患先天性疾病。以四川凉山州彝族聚居区为例,近年来的以

针头注射吸食为主要途径的毒品问题,已经成为大小凉山地区反贫困工作中的一个严峻挑战。因吸食毒品导致贫困甚至陷入破产的家庭非常多,这种“输入型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民族地区群众卫生健康知识匮乏。

因毒品产生的大小凉山地区艾滋病问题非常严重,大凉山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的高发地区。一些艾滋病的父母已经去世,留下“失依儿童”。据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政局统计,2010年末,父母双亡的孤儿接近7000人,其中昭觉县人数最多,接近4800人,而昭觉县也是凉山州毒品和艾滋病问题最突出的、最严重的县。如果考虑艾滋病病毒(HIV)的母婴传染等因素,孩子受毒品的影响将会更大。

同时,贫困家庭往往因为经济状况所限以及营养知识相对缺乏等原因,儿童营养不良现象突出,孩子身体健康状况堪忧。目前,国家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680个县开展了中小学“免费午餐”项目试点,实际上,学龄前的儿童营养与健康干预更为重要,尤其是对贫困家庭来说,例如贫困家庭父母“有病不能及时就医”比例相对较高,孩子健康受到威胁的几率更大。儿童营养和健康问题,一方面导致看病、吃药等费用支出显著增加,使贫困更加严重;

另一方面,营养不良等又会导致孩子学习效率、学习质量下降,人力资本积累缓慢,成年之后陷入贫困风险大大高于营养健康的同龄人,形成贫困代际传递。

参考文献:

[1] Andrew Shepherd. Tackling Chronic Poverty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1, 5(2): 136-138.
 [2]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The Chronic Poverty Report 2004-05 [M]. Manchester Press 2005.
 [3] Hulme D. Conceptualizing Chronic Poverty [J].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 403-423.
 [4] Mc Gregor J A, Copestake J G, Wood G. The Inter-generational Bargain: An Introduc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9, 10(12): 447-451.
 [5] Kabeer N.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s,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Parents, Children and Investing in the Futur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12(4): 463-82.
 [6] 凉山州扶贫办. 凉山彝族自治州“十一五”扶贫开发工作情 [EB/OL]. http://www.lsz.gov.cn/Detail/xxgk-fzgh/a66a57da-9fe9-4d99-ad45-1f69bfc1ba22 2011-11-15.

(责任编辑:李 镜)

(上接第72页)资本投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因素,基于模糊 DEMATEL 方法提出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对8个影响因素予以了深入分析。研究表明,政府投资观念(C₅)、国民经济发展水平(C₁)、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C₇)为原因因素,对其他因素影响大。教育投入体制(C₃)、医疗体制与政策(C₄)、人力资本流动(C₈)、家庭收入水平(C₂)、家庭教育投资观念(C₆)为结果因素,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大。最后,通过因素中心度分析,指出上述8个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说明它是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水平高低的核心所在,要提升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长远之计是努力发展经济,以增强政府、社会和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后劲。同时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欠发达地区应采取可行的措施,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为经济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江永红. 中国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人力资本研究[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2] 西奥多·W·舒尔茨. 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2.
 [3] 王伟明. 湖州市高素质人才资源开发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D]. 杭州: 浙江工业大学, 2004.
 [4] 中国的人力资本与地区协调发展[EB/OL]. www.docin.com/p-286827406.html.
 [5] James J Hec kman. China'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5(16): 50-70.
 [6] Bas Jacobs. Real Options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J]. Labour Economics, 2007, 14(6): 913-925.
 [7] 李中华. 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因素分析[J]. 学术交流, 2003,

112(7): 83-84.
 [8] 张艳华.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07, 21(6): 54-58.
 [9] 许项发. 影响陕西人力资本投资的因素及应对策略[J]. 统计与决策, 2005(9): 116-118.
 [10] 耿庆霞. 影响西部人力资本投资的因素分析[J]. 人才资源开发, 2006(7): 16-17.
 [11] 王玉龙, 丁文锋. 农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TPB理论与63家农业企业微观数据[J]. 经济经纬, 2011(1): 105-110.
 [12] 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基地, 贵州省财经学院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13] 贝克尔. 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和政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EB/OL]. http://theory.people.com.cn/GB/68294/117763/6999890.html.
 [15] Jassbi J, Mohamadnejad F, Nasrollahzadeh H. A Fuzzy DEMATEL Framework for Modeling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of Strategy Map [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11, 38(1): 5969-5972.
 [16] Wu W W. Segmenting Critical Factors for Successful Knowledge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Using the Fuzzy DEMATEL Method [J]. Applied Soft Computing, 2012, 12(1): 527-535.
 [17] 孙永河, 宋晓莹, 段万春, 等. 开放存取对期刊论文学术交流系统的影响因素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11, 55(24): 132-136.
 [18] Tzeng G H, Teng J Y. Transportation Investment Project Selection with Fuzzy Multiobjectives [J].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Technology, 1993, 17: 91-112.
 [19] 马晶梅. 高校科研诚信档案建设关键因素辨识 [J]. 中国市场, 2012(26): 106-108.

(责任编辑:李 镜)